

## 評介賈克琳·杜維涅·伯朗：《巴達貢 巨人：人類起源之旅》

書名：Les Géants Patagons : Voyage aux Origines de l'Homme  
作者：Jaqueline Duvernay-Bolens  
出版者：Paris :Editons Michalon  
出版年：1995  
頁數：371

楊彥彬\*

賈克琳·杜維涅·伯朗女士是法國巴黎高等社會科學院（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所屬「社會人類學實驗室」（Laboratoire d'Anthropologie Sociale）成員，專長是人類學發展史，目前進行與19世紀種族主義起源相關的歷史研究，其作品散見《法國民族誌》（Ethnologie Française）、《人類》（Homme）。她的這本《巴達貢巨人：人類起源之旅》所要探討的主題是近代人種分類知識的形成過程，尤其是16世紀旅遊記敘中所傳述的南美洲高大巨人族如何成為西方學界討論的對象，最後甚至成為19世紀種族主義起源的因子之一。

全書集中在「巴達貢巨人」（les Géants patagons）的主題，而寫作方式則以時間為敘述軸心。為了呼應這個貫時性要求，結構上以年代區分成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受到質疑的人類概念」（16世紀）、

---

\*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第二部分「自然的邊界」（17、18 世紀）、第三部分「分類的時代」（18 世紀後半、19 世紀）。在每個部分之下，再以各個時代中，歐洲學者們對於這些南美洲巨人族所提出的各種不同看法為中心來安排相關章節，希望藉由學者的不同論述方式來呈現 16 到 19 世紀科學論述形成的多元脈絡。以下，先以章節為單位，介紹本書的內容。

## 一、內容大要

在〈導論〉中，伯朗女士指出本書主旨：她將以 1522 年，皮戈飛達（Antonio Pigaffetta, 1480 ?-1534）追隨麥哲倫環球航行之後，在其《麥哲倫的第一次環球之旅》一書中所敘述的「巴達貢巨人」為中心，重建 16 世紀至於現今有關人類多樣性的反思。她認為皮戈飛達筆下的巨人族並不是真實的觀察，而是另有來源，極可能出自 1512 年 Primaleon 的小說。此外，在 16 世紀，不只遊記、騎士小說中有巨人的身影，在民間傳說（les thèmes folkloriques）中也可以見到。這種流傳甚廣的俗民傳統是當時人們相信「巴達貢巨人」存在的文化溫床。

第一部分下分三章。第一章「邊地族群」，主要討論遊記所提供的資訊如何成為當時人的地理知識。自從皮戈飛達的遊記出版後，「巴達貢巨人」開始出現在當時歐洲人所製作的地圖、地球儀上。如：1540 年，木斯特（Sebastian Münster, 1489-1552）的地圖中，從分隔現今烏拉圭與阿根廷的拉布拉他（Rio de la Plata）河口，一直到麥哲倫海峽的這一大片廣大地區，只有一個名稱：「巨人區」（Regio gigatum）。美洲的發現並沒有使得從古代以來關於「南方大陸」的傳說，以及此地居民（Antipodes）以頭走路的想法受到質疑：「巴達貢巨人」的奇怪傳說可以由此脈絡來理解。而文藝復興時期人文學者所發現的古希臘文獻，也可能有推波助瀾之效。如，古希臘時期，艾李安（Elien）曾提到：在歐亞非大陸之外，另有一大陸，其住民身高為歐人的兩倍，生命亦長兩倍。1569 年，在麥卡托（Gerhard Kremer

Mercator, 1512-1594) 的地圖上，他在南美洲地區畫了兩個身高兩倍於歐人的「巴達貢巨人」。因此，我們不能低估這些古代文獻在塑造南美巨人族的迷思中所扮演的角色。但是，這些巨人的出現，挑戰了《聖經》中人種單一起源論的觀點：如果舊大陸居民是亞當的後代，那麼新大陸高大身材的巨人很可能不是亞當的子孫，而來自另一個不同來源。

第二章「神學問題」主要處理的是神學家如何解決這些謎樣巨人起源的問題。爭論的焦點集中在《聖經》《創世紀》第 6 章 1 到 6 節經文中提到的巨人。從 1521 到 1625 年，歐洲宗教改革所引發的持續性宗教戰爭，使得情況更加複雜：宗教的爭端反映在聖經的翻譯與詮釋上，使得聖經研究成為不同教派的角力戰場。〈創世紀〉第 6 章第 4 節關於巨人的經文遂成為天主教、新教的論戰焦點。亞里斯多德 (Aristote, 384-322 B.C.) 關於形式 (forme) 與物質 (matière) 的分類範疇，使得天主教神學家可以將這些南美巨人歸類於「物質的特殊變異」(des variétés accidentelles de la matière)，而使得「人類的基本形式」(la forme essentielle de l'homme) 不受到質疑，而維持單一起源論的有效性。但是新教神學家則對《創世紀》中所敘述的巨人採取隱喻的解釋方式：他們認為「巨人」象徵「暴君」(tyrans)，其「高大」只是描述其罪惡之大，與身材毫不相干。因此，由這種解釋方式，新教神學家消除了《創世紀》中的「巨人」：實際上，他們與一般人的身材相同。

第三章「新原住民」則換個角度，處理 16 世紀自然學者的看法。米蘭醫生卡當 (Jérôme Cardan, 1501-1576) 主張巨人的存在：因為從《聖經》記載、古代文獻、美洲新發現的「巴達貢巨人」都證明人類中有身材體型的差異。但是，怎麼可能出現這種巨大的體型？他引用亞里斯多德的「自發生成論」來說明：但是不同於後者認為只有昆蟲蚊蠅才是由「自發生成」的方式來繁殖，卡當把此概念運用到動物與人類身上。但是，斯卡林傑 (Jules César Scaliger, 1484-1558) 援引亞里斯多德「形式」與「物質」的概念，批評卡當的看法錯誤，因

為他不該使用「個別特例」( *singularités individuelles* ) 來界定「物種」( *espèces* )。然而，布魯諾 ( *Giordano Bruno, 1548-1600* ) 否認「有性生殖」( *génération sexuée* ) 與所有人類來自亞當的傳統看法，而主張多元起源論：美洲人是在當地「自發生成」的結果，因此他們是「原住民」( *autochtones* ) 而不是移民。新教、舊教的神學家很快起來攻擊把美洲人視為土著的看法。1589 年，耶穌會士阿科斯達 ( *Joseph de Acosta, 1540-1600* ) 認為美洲人、美洲動物源自舊大陸：他們是經由兩大陸間相連的陸路逐漸擴散到新大陸，之後由於逐漸受到新環境的影響，而產生一些偶然的變異，表面上雖有差異，但並沒有本質上的不同。

第二部分包括四章。第一章「巴達貢巨人中的加利略」，處理數學的比例原則如何進入與巨人相關的討論中。1613 年，在法國多芬內地區 ( *Dauphiné* ) 墳墓中發現巨大骸骨。皇家外科醫生哈比各 ( *Nicolas Habicot, 1550-1624* ) 以其解剖經驗，斷定是巨人遺骨。但是皇后專屬內科醫生利歐隆 ( *Jean Riolan, 1577-1657* ) 則由「比例」( *proportion* ) 的角度批評哈比各：大自然有其「界限」( *bornes* )，這使得碩大無比、不成比例的巨人不可能存在。但是哈比各認為：人類不可能知道所有上帝造物的原因，因此人類不該以其有限的知識否定特大巨人的存在。1638 年，加利略 ( *Galilée, 1564-1642* ) 在其《關於兩門新科學的數學論證》( *Discours et Démonstrations mathématiques concernant deux sciences nouvelles* ) 中，也以比例原則討論人類的身材與外形的問題。

第二章「無可置疑的巨人」承接上一章的比例主題。倫敦皇家學會成員莫林納 ( *Thomas Molyneux* ) 到來登 ( *Leyde* ) 旅遊時，發現一塊人類的巨大前額骨 ( *os frontis* )。1702 年，莫林納在畫家友人的協助之下取得該頭骨破片的素描，並與正常人的頭骨進行比對，認定此巨形前額骨的長、寬、厚度皆符合比例原則。於是，莫林納運用利歐隆的方法證明了相反的事：利歐隆以比例原則反駁哈比各，認為特大巨人不可能存在。但是在利歐隆與莫林納的兩個例子中，卻有不同的

意義：在相信巨人存在的時代，利歐隆的看法使人們所相信的巨人身高降低了一半；但是在一個不再相信超大型身高巨人存在的年代，莫林納的看法則把人類的身材推到極限。對莫林納來說，巨人構成人類身材變異的極端（*les variations extrêmes*）；雖然這個極端可能只是個別性的，但是如果有了生殖機制的介入，人們可以毫無困難的從個別變異得出巨人族群遺傳變異的證明。打破了「自然的限制」之後，巨人與平常人身高之間的差距不再是「不正常」（*anomalie*），反而變成了「自然的無盡多樣化傾向之展現」。於是，從一個「自然之中，物種各自分立」的概念轉而主張「存在鎖鏈」（*la chaîne des êtres*）的看法，自然學者以「連續的模式」（*un modèle continu*）取代「不連續的模式」（*un modèle discontinu*）。

第三章「啟蒙世紀的皮戈飛達」以 18 世紀拜倫船長（*John Byron, 1723-1786*）航行遊記的出版為例，說明遊記對啟蒙哲士思想的影響。18 世紀後半期，英法兩國在「南海」（*les mers australes*）進行探險競爭。1764 年，英國政府派遣拜倫到南方進行探險。1766 年 5 月，拜倫返英後，英國的新聞雜誌開始出現「拜倫在美洲遇到身材高大族群」的消息。而且這個消息被皇家學會秘書馬提醫生（*Matthew Maty, 1718-1776*）證實，轟動英倫海峽兩岸。約在同時，法國的布根維爾（*Louis Antoine Bougainville, 1729-1811*）也在「南海」進行探險；在第三次航行的日誌中，他提到他所見到最高的「巴達貢巨人」不超過 190 公分。在法國人眼中，布根維爾的證詞優於馬提的保證。法國報刊紛紛更正，宣布「巴達貢巨人」並不存在。但是 1767 年，高依耶（*Gabriel François Coyer, 1707-1782*）出版《論巴達貢巨人書簡》（*Lettre sur les Géants Patagons*），支持馬提的主張。高依耶指出，布根維爾及其隨員所見到的族群與英人拜倫所遇到的不同，所以不能據此否定「巴達貢巨人」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高依耶的書與某匿名者所編的拜倫遊記的法文譯本同時出版。於是，法國報刊的輿論再度轉向，支持「巴達貢巨人」存在。在這一連串事件中，法國學者猶疑不定的態度最具代表性的是拉共但銘（*Charles-Marie de La*

Condamine, 1701-1774)：1766 年，他根據布根維爾的說法，公開宣稱南美洲「巴達貢巨人」只是「幻想」(fable)；但不到兩年時光，他就在《博學者月刊》(*Journal des Sçavans*) 公開撤銷他先前的懷疑。

第四章「大型物種的特權」討論 18 世紀最著名的自然學者布豐 (Buffon, 1707-1788) 對南美巨人族看法的轉變：1749 年，他否認南美巨人族的存在；但是在 1777 年，他徹底改變之前的看法。這個轉變，可能與西伯利亞、北美地區發現的巨形骨骸有關：1761 年，他似乎認為這些骨頭比現存的大象要大，可能屬於一個已經滅絕的種類 (espèce)。但是 1764 年道般東 (Louis Jean-Marie d'Aubenton, 1716-1800) 以巴黎皇家動物園的大象遺骨與前述兩地的骨骸做比較研究之後認為：這些骨骸外形上的不同，只是年齡、性別所偶然造成的差異，不是種類的不同。這使得布豐對「退化的過程」改採比較審慎的態度。1761 年，布豐在討論新舊大陸動物的不同時，認為新大陸動物體型的矮小是來自於「退化的過程」(un processus de dégénération)，這顯示物種的「形式」(forme) 不是不可變的；布豐在此承認了「變異的概念」(la notion de variété)，而且此概念不限於偶然的變異，而是能夠導致新物種出現的變異。此時，布豐的反思為「轉形論」(caractère transformiste) 開出了可能性；但是後來道般東的研究結論，可能使得布豐認為「退化」不會造成大型物種的不同。然而，1769 年杭特 (William Hunter, 1718-1783) 認為道般東的看法為誤：杭特認為北美洲所發現的奇特骨骸是屬於某謎樣「未知動物」(animal incognitum)。布豐知道杭特的結論。1778 年，布豐認為這個「未知動物」比已知最高大的大象還要高：「高大的外形」在布豐的描述中扮演重要角色。從布豐對高大「未知動物」的接受，我們不難理解大約在同時期 (1777 年) 他也改變先前的看法，而接受南美巨人族的存在。

第三部分包括兩章。第一章「人與獸」處理 18 世紀後半期到 19 世紀前半期的學者如何在動物分類架構中構思人類的位置。1746 年，

林奈 ( Carl von Linné, 1707-1778 ) 已經承認：在動物層面，他「找不到任何能夠區分人類與猿猴的特徵」。在 1758 年第十版的《自然體系》中，他把人、猴共同隸屬於更高層次的「目」( ordre )。我們可以說，在林奈的分類架構下，人、猴之間的距離被拉近。1779 年，布魯門巴赫 ( Johann-Friedrich Blumenbach, 1752-1840 ) 第一個起來反對林奈的分類方式。前者認為：在分類時，不能只考慮人類的「動物判準」( caractères zoologiques )，也要考慮「理智判準」( caractères intellectuels )，這樣才能在自然的分類架構中為人類保留一個特殊的位置。布魯門巴赫的做法是在「目」的層次就將人、猴做出區隔：人屬於「雙手目」( l'ordre des bimanés )，猴則屬於「四手目」( l'ordre des quadrumanés )；因此，在「屬」( genre )與「種」( espèce )的分類層次上，人類都自成一個獨立的分支，與猴渺不相涉。19 世紀主張人種單一起源論者都採用布魯門巴赫的分類方式，為人類保留一個獨特的地位。而主張多元起源論者多持守林奈的分類方式，強調人、猴（特別是猩猩〔orangs-outangs〕）在體質上的類似性，而拉近人、猴的距離。這兩派的論爭焦點集中在猩猩手指與足指的區分，以及「猩猩的四肢是屬於雙手雙足還是屬於四手」。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人類體質特徵（雙手）取代理性成為人猴之間的區別標準；但是這種解剖學的爭論主題，只是先前人類與動物以「靈魂」( l'âme )之有無為區分的變形而已。

第二章「種族與語言」討論達爾文 ( Charles Darwin, 1809-1882 ) 把時間面向引入人類分類中所引起的關於人種、文化優劣的看法。19 世紀的自然學者，在構思他們的分類體系時並沒有考慮時間的面向；「時間」變數的介入，使得物種與物種之間間隙被打破，而「貫時性」( dimension diachronique ) 成為《物種起源》( 1859 ) ( *L'Origine des espèces* ) 與「上帝創造論」( système créationniste ) 間的基本不同。使人類來自猿猴之後，達爾文去除了人類在自然中的獨特地位。為了捍衛他的想法，他還必須回應單一起源論者對於語言起源的看法：後者認為語言是人類與所有其它動物之間一道無法跨越

的鴻溝。在這個角度之下，達爾文在《人類的由來》（1871）（*La Descendance de l'Homme*）中特別討論語言。但是，在《物種起源》與《人類的由來》之間，演化一詞有不同的意涵。在《物種起源》中，現存的動植物種類不一定優於化石種類，只是前者能採取最好的方式適應環境並繁衍後代，也就是說物種分殊化並不是「優越化」（*supériorité*）的過程。但是在《人類的由來》中，這種「適應原則」（*le citère d'adaptation*）變成「普遍階序化的原則」（*un principe général de hiérachisation*）：不同的人種代表從「獸性」（*animalité*）到「文明」（*civilisation*）過程的不同階段。怎麼會有這種意義的變化？在達爾文出版《人類的由來》之前，西歐學者已經有許多關於語言演化的討論。日爾曼學者施萊舍（August Schleicher, 1821-1868）認為語言和大腦、發音器官密切相關，所以人種的分類必須建立在「語言的比較解剖學」（*l'anatomie comparée des langues*）之上。對施萊舍來說，印歐語系中的語言為「結構上最高級的語言」。在人類的語言中加入了區分優劣的觀念之後，施萊舍的語言演化觀離開了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中沒有價值評判的「適應原則」，而為後來《人類的由來》中的「進步觀」（*l'idée de progrès*）、「普遍階序化的原則」開出了道路。在 18 世紀，布豐人類學中的理想型態是高大的白人；在 19 世紀，對主張演化的達爾文來說，猿猴取代巨人在其體系中佔有重要的地位。然而，在 19 世紀，布豐的理想人類型態並沒有消失：長期被認為是人類高貴起源見證的「巴達貢巨人」雖然失去他們的舞台，但是取而代之的是象徵人類在體質、文化上演化最高階段的高貴、不可征服的印歐種族。

最後的「結論」則回顧全書的論點。在 19 世紀，猿猴取代了「巴達貢巨人」的模糊地位。介於人與動物之間，猿猴被賦予「半人腳」（*pieds semi-humains*），正如同之前人們認為「巴達貢巨人」擁有「半獸腳」（*pieds semi-animaux*），而質疑其人類的地位。在這兩個例子中，人類概念的邊界（*les limites de l'homme*）都被這些擁有奇形怪狀畸形腳的族群所挑戰。而當巨人高大身形的「異常」最後轉並

成印歐民族的優越地位時，滑稽可笑的猿猴卻成為原始民族的象徵。從這個角度來看，科學的地位有如「迷思」( mythe )。

## 二、評論分析

### (一)研究方法

伯朗女士最大的貢獻在於還原 16 到 19 世紀近四百年西方學界對「巴達貢巨人」眾多討論、分析的背景。她的研究結果指出：西方關於「巴達貢巨人」最早的記載來自於皮戈飛達 ( Antonio Pigaffetta, 1480 ?-1534 ) 的遊記，但是這個記載的藍本非常可能來自小說。這顯示，16 世紀的歐洲有一個廣大的俗民文化層所提供的集體心態因素，使得當時社會 ( 包括學者與平民 ) 對這個遙遠巨人族的存在深信不疑。也就是說，如果從一個更廣闊的角度來看，「在 16 世紀，巨大身材的主題形成俗民信仰與神學評論的共同基礎」。<sup>1</sup>因此，對伯朗女士來說，問題不在於皮戈飛達的描寫是對還是錯，重要的是「重建使當時人相信皮戈飛達記載為真的認知環境」。<sup>2</sup>從這個角度出發，她的這本著作補充了史蒂芬·古爾德 ( Stephan Jay Gould, 1941-2002 ) 〈身材與形狀〉一文的不足：<sup>3</sup>古爾德在文中只略略提到 16 世紀學者對於生物體身材大小與外形相關性的討論，但是古爾德忽略了這個討論，其實只是當時西歐學界對於「巴達貢巨人」極感興趣的一個側面而已。

我們可以說伯朗女士不僅僅只想寫科學史，她更想要以「巴達貢巨人」為引子，呈現各個時代圍繞著相同主題所構想出的各種不同解

<sup>1</sup> Jaqueline Duvernay-Bolens, *Les Géants Patagons : Voyage aux Origines de l'Homme*, Paris : Editions Michalon, 1995, p.13.

<sup>2</sup> Jaqueline Duvernay-Bolens, *Les Géants Patagons : Voyage aux Origines de l'Homme*, p.23.

<sup>3</sup> Stephan Jay Gould, "La taille et la forme", *Darwin et les Grandes Enigmes de la Vie*, traduit de l'américain par Daniel Lemoine, nouvelle édition établie par Marcel Blanc, Paris : Pygmalion, 1979, pp.183-190. 此書英文版 ( *Ever Since Darwin: Reflections in Natural History* ) 出版於 1977 年。

釋方式，這使得科學論述本身成為反應社會文化的產物：伯朗女士稱之為「社會事實」（un fait social）。<sup>4</sup>她想從「心態工具」（l'outillage mental）的轉變著手進行這個「社會事實」研究。<sup>5</sup>從全書來看，她所選擇分析的「心態工具」大致分為兩種：第一種是集中在第一部分第一章中所討論的地圖或「地球儀」（mappemondes），第二種則是在本書其它部分所採用的大量文字作品（包括遊記、古典文學、聖經詮釋、小說、科學論著、新聞報刊）。運用這些類別不同、讀者身份迥異的資料，伯朗女士企圖呈現一個想像與理性交融的歷史圖像。

伯朗女士並沒有說明她的「心態工具」研究取徑的由來。但是，在討論利用地圖的說明文字與圖像來探索某時代的思想時，她引用費夫賀（Lucien Febvre, 1878-1956）在《十六世紀的不信問題：拉伯雷的宗教》中所強調「思想的物質載體」（support matériel de la pensée）研究的重要性。<sup>6</sup>這暗示著伯朗女士「心態工具」的研究取徑可能來自費夫賀。在《十六世紀的不信問題》一書中，費夫賀曾經提到：「心態工具」的缺乏，不只會造成某種思想難以出現，甚至根本阻礙該思想的產生。<sup>7</sup>由此，費夫賀指出：某些 18 世紀法文字彙的缺乏、語法結構的缺陷，使得 16 世紀的拉伯雷不可能是 18 世紀式的理性主義者，更不可能是激進的無神論者。<sup>8</sup>我們可以問：為什麼伯朗女士會引用費夫賀這本著作？除了研究方法論的借鏡之外，不要忘了拉伯雷小說中的主角也是巨人。

對費夫賀來說，重建一個時代思想狀態的「心態工具」不只是語言。出版《十六世紀的不信問題》的前一年（1941），他在《社會史

<sup>4</sup> Jaqueline Duvernay-Bolens, *Les Géants Patagons : Voyage aux Origines de l'Homme*, p.23.

<sup>5</sup> Jaqueline Duvernay-Bolens, *Les Géants Patagons : Voyage aux Origines de l'Homme*, p.23.

<sup>6</sup> Jaqueline Duvernay-Bolens, *Les Géants Patagons : Voyage aux Origines de l'Homme*, p.63, note 2.伯朗女士在註釋中所引用的例子是費夫賀討論 16 世紀學者在算數計算中缺乏加、減符號的情況。參：Lucien Febvre, *Le Problème de l'Incroyance au XVIe Siècle : La Religion de Rabelais* (1942), édition revue, Paris : Editions Albin Michel, 1962, pp.421-426.

<sup>7</sup> Lucien Febvre, *Le Problème de l'Incroyance au XVIe Siècle : La Religion de Rabelais*, p.384.

<sup>8</sup> Lucien Febvre, *Le Problème de l'Incroyance au XVIe Siècle : La Religion de Rabelais*, pp.385-393.

年鑑》( *Annales d'Histoire Sociale* ) 發表《如何重建感情生活：情感與歷史》一文，提出研究情緒史的三種工具：字彙( *vocabulaires* )、藝術圖像( *l'iconographie artistique* )與文學( *la littérature* )。<sup>9</sup>人類過去的情感與思想已經消逝無蹤，所能憑藉重建的物質載體只剩下文字與圖像兩種資料。在該文中，費夫賀特別指出藝術史家馬爾( *Emile Mâle, 1862-1954* )的貢獻：後者運用圖資料研究不同時代的宗教感，以及分析造型藝術中某些細微的情感呈現。一直到 1978 年，法國中古史家勒高夫( *Jacques Le Goff, 1924-* )在其《新史學》一文中，仍然強調要把文學與藝術圖像資料整合進入「想像史」( *l'histoire de l'imaginaire* )的研究中。<sup>10</sup>

在伯朗女士的著作中完全沒有引用勒高夫的著作。倒是前者曾經在本書提到，中古時期小說《亞歷山大傳奇》( *Roman d'Alexandre* )中所敘述的印度「狗頭人」( *les Cynocéphales* )傳說。<sup>11</sup>關於中古西方對於印度的想像，筆者認為不能不提到一篇勒高夫的文章：《中古西方與印度洋：想像之域》。文中，勒高夫提到：西方中古時期對於印度洋地區的想像透過不同的管道( 雕塑、科學文獻、小說 )進入大眾心態中，這種虛幻的「印度意像」形成「集體感與集體心理學的見證」。<sup>12</sup>那麼，如何重建這種抽象的、已經消失無蹤的「集體感與集體心理學」？勒高夫選擇分析的「心態工具」與伯朗女士相同：地圖與地球儀。勒高夫也企圖從這些地圖與地球儀上的文字與圖像來重建中古到 15 世紀西方人對於印度洋地區意像的變遷。他的結論是：15 世紀地理知識的最大突破是放棄「印度洋是封閉的」看法。<sup>13</sup>如果用勒高夫自己在另一篇文章中的話來說：這種「集體感與集體心理學」

<sup>9</sup> Lucien Febvre, "Comment Reconstituer la Vie Affective ? La Sensibilité et l'Histoire" (1941), *Combats pour l'Histoire*, Paris : Armand Colin, 1992, pp.231-234.

<sup>10</sup> Jacques Le Goff, "L'Histoire nouvelle"(1978), in Jacques Le Goff ( sous la dir. ), *La Nouvelle Histoire*, Paris : Editions Complexe, 1988, p.64.

<sup>11</sup> Jaqueline Duvernay-Bolens, *Les Géants Patagons : Voyage aux Origines de l'Homme*, p.49.

<sup>12</sup> Jacques Le Goff, "L'Occident médiéval et l'océan Indien : un horizon onirique"(1970), *Pour un Autre Moyen Age*, Paris : Gallimard, 1977, p.280.

<sup>13</sup> Jacques Le Goff, "L'Occident médiéval et l'océan Indien : un horizon onirique", *Pour un Autre Moyen Age*, pp.280-282.

研究的側重面向是「日常人」(l'homme quotidiens)、是「歷史發展過程中變化最少的部分」(“ce qui change le moins” dans l'évolution historique)。<sup>14</sup>勒高夫還敏銳的觀察到中古史學者研究問題意識的轉變。從皮黑納(Henri Pirenne, 1862-1935)對中古城市、中等階級的研究,到布洛赫(Marc Bloch, 1886-1944)、杜比(Georges Duby, 1919-1996)對中古農村史的側重:勒高夫稱之為「史學的鄉村化」(une ruralisation de l'histoire)。<sup>15</sup>這種史學研究的轉變暗示著從傳統以精英人物為主要的思想史研究轉向社會底層的民間傳說、大眾文化、俗民信仰等心態史、想像史的探索。從這個脈絡來看,我們不難理解 1978 年勒高夫提倡想像史研究的原因。

這種「史學的鄉村化」的研究傾向,在伯朗女士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到。她從一個來自俗民傳說、<sup>16</sup>大眾小說的遊記記載出發,透過地圖、聖經詮釋、科學期刊等資料,重建 16 世紀到 19 世紀種族主義的出現過程。她所呈現的科學史研究是一個大眾想像與學術論述相互夾雜的歷史圖像。

## (二)知識的形成

伯朗女士的著作所處理的主題是科學知識形成的歷史研究。她的研究結果顯示:從 16 世紀到 18 世紀,西方學者關於外國知識的來源主要來自遊記與古典文學。但是由於引用資料的歐洲學者多半沒有出國實地考察,只能坐在歐洲的城市中等待他人資訊傳輸。於是,旅遊者的證詞與報導變得非常重要:一旦旅遊者有意說謊,或無意間把把道聽塗說寫入遊記中,這些被動接受資訊的學者將難以查證消息的真

<sup>14</sup> Jacques Le Goff, “L'histoire et l'homme quotidien”(1972), *Pour un Autre Moyen Age*, Paris :Gallimard, 1977, p.339.

<sup>15</sup> Jacques Le Goff, “L'histoire et l'homme quotidien”, *Pour un Autre Moyen Age*, p.339.

<sup>16</sup> 伯朗女士注意到了 16 世紀所傳述的「巴達貢巨人」有民間傳說、大眾文化的基礎,也引用了費夫賀關於拉伯雷的研究。比較奇特的是,她並沒有引用巴赫汀(Mikhail Bakhtine)討論拉伯雷小說與大眾文化的書:《弗朗索瓦·拉伯雷的著作與中古、文藝復興時期的大眾文化》(*L'Oeuvre de François Rabelais et la Culture Populaire au Moyen Age et sous la Renaissance*, Paris : Gallimard, 1970)。

假。正因為這種情形，處於知識生產「裝配線」(an assembly-line) 下游的學者，<sup>17</sup>把新接受的資訊轉化成知識的過程中，免不了會夾雜某些當時的幻想資料，甚至加入一千多年前古典希臘羅馬作品的片段。這種知識形成的情況，伯朗女士在其著作的第一部分第一、第二章與第二部分第三章都有說明。

如果把歷史的場景換到東方：一個 17 世紀的西方傳教士來到中國時，當時他所介紹的西方知識也無可避免會有類似情況發生。1623 年（明天啟 3 年），艾儒略（Guilius Aleni, 1582-1648）在其《職方外紀》〈智加〉條中寫道：

南亞墨利加之南為智加，即長人國也。地方頗冷，人長一丈許，遍體皆毛。昔時人更長大，曾掘地得人齒，闊三指，長四指餘，則全身可知也。其人好持弓矢，矢長六尺，每握一矢插入口中，至於設羽以示勇。男女皆以五色畫面為文飾。<sup>18</sup>

謝方的註釋並沒有考察這段文字可能的出處。這段文字很明顯是在描寫 16 世紀以來在西歐流傳極廣的南美洲「巴達貢巨人」。艾儒略的資料來源可能來自當時歐人的遊記集，或是其它根據遊記所撰寫的地理書籍。在《職方外紀》中，我們不只發現與遊記有關的資料，還可以讀到來自西方古典文學的片段。在〈利未亞總說〉條中，艾氏寫道：

界內名山有亞大蠟者，在西北，天下惟此山最高，凡風雨露雷皆在山半，山頂終古晴明，視日星倍大。昔有人畫字於灰上者，歷千年不動，無風故也，國人呼為天柱。此方人夜睡無夢，甚為奇。[……]<sup>19</sup>

謝方同樣沒有指出這段艾儒略的文字可能憑依的資料。但是如果

<sup>17</sup> Peter Burke, *A 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 from Gutenberg to Diderot*, Polity, 2004, p.75.

<sup>18</sup> 艾儒略原著，謝方校釋，《職方外紀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 129。

<sup>19</sup> 艾儒略原著，謝方校釋，《職方外紀校釋》，頁 107。

我們對比一下希羅多德 ( Herodotus, 484 ?-425 ? B.C. ) 在《歷史》中的這段文字：

[……]從加拉曼人 ( Garamantians ) 的地方再走十天，又會遇到鹽山和水，在那周邊住著的人叫做阿塔蘭人 ( Atarantians ) 。 [……]在這個鹽山的附近有一個做阿特拉斯 ( Atlas ) 的山，[此山形狀]尖細且為圓筒形；據說，它是如此之高以致於人們看不到其頂端；而且無論夏季或冬季，都有雲環繞。當地人稱此山為「天柱」 ( the Pillar of Heaven ) ；當地人從這個山得到他們的名字，遂被稱為阿特蘭人 ( Atlantes ) 。據說，他們不吃活着的生物，且從不做夢。<sup>20</sup>

艾儒略文中的「亞大蠟」、「天柱」、「此方人夜睡無夢」知識來源可能來自希羅多德的著作，或是來自根據希羅多德作品所撰寫的一些後來的地理作品。從上面兩段《職方外紀》的文字來看，17 世紀艾儒略所傳佈的西方地理知識正好是遊記與古典文學的混合體。如果我們了解近代西方知識的形成方式，我們就不會認為艾儒略文中的「長人國」是無稽之談。在他的作品中，雖然有些從我們現在眼光看來難以理解的段落，但也正由於這種怪誕性，使得《職方外紀》這個文本呈現了它的時代性。而深入疏解陌生的文本，並進而指出此文本與週遭時代、社會環境的相關意義，正是史家的最大挑戰。面對這個艱難的挑戰，美國史家羅伯·丹屯 ( Robert Darnton ) 有一段很好的說明：

[……]翻開 18 世紀的格言集，你會找到這樣的條目：「誰流鼻涕，就讓他擤鼻子」 ( He who is snotty, let him below his nose ) 。看不懂一句格言、一個笑話、一個儀式，或一首詩時，我們知道其中必有通幽的曲徑。在文件最隱晦之處挑三揀四，或許能夠解

<sup>20</sup> Herodotus, "Book Four. 184", *Histories*, translated with notes by George Rawlinson, Wordworth Editions Limited, 1996, p.370. 譯文曾參考：王以鑄譯，《希羅多德歷史》(上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頁 337。

開聞所未聞的意義系統。這樣的線索甚至可能引出令人嘖嘖稱奇的世界觀。<sup>21</sup>

我們可以說伯朗女士以「巴達貢巨人」為主題，在 16 到 19 世紀長達四百年的文獻迷宮中，爬梳出了一條「通幽的曲徑」，為我們指出近代科學知識發展中「聞所未聞的意義系統」。

### (三)現在與過去：人類學式的研究取徑

如果 20 世紀的讀者難以讀懂 18 世紀的格言集，這種陌生感表示：過去人們的思考模式很可能與我們現在的價值意義系統有很大的不同，這也使得後世的研究者可能由自己的價值意義系統出發，對過去的文本進行錯誤的解讀。那麼，如何才能避免費夫賀在《十六世紀的不信問題》中所嚴厲抨擊的歷史研究中「罪惡中的罪惡：年代倒置 (l'anachronisme)」？<sup>22</sup>

現代的歷史學者提出了「人類學式的研究取徑」(an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sup>23</sup>避免我們自己運用後來的價值意義系統誤讀了古代的文本。英國史家彼得·伯克在向處身 20 世紀的讀者介紹 17 世紀有關路易十四的頌詩、肖像畫中的寓言典故與象徵意義時寫道：

[……]至於偉大人物的頌讚文字，這些詩文聽在我們民主時代人們的耳中既像奴顏卑膝，又如曲意巴結。這些心態、價值與預期心理的變遷，形成理解路易十四世紀藝術與文學的最主要障礙：[因為]這些變遷會引起年代倒置的判斷。

有鑒於這個文化上的差距，採用人類學家（他們是理解其它文化的專家）的研究策略，以使得現在的讀者與觀眾可以理解路易十

<sup>21</sup> Robert Darnton, "Introductio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Vintage, 1985, pp.4-5. 此中譯文採用：呂健忠譯，〈序〉《貓大屠殺：法國文化史鉤沉》(台北：國立編譯館，2005)，頁 XI。

<sup>22</sup> Lucien Febvre, *Le Problème de l'Incroyance au XVIe Siècle : La Religion de Rabelais*, p.6.

<sup>23</sup> Peter Burke, *A 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 from Gutenberg to Diderot*, p.82.

四時代的藝術、禮儀與文學，可能是聰明的方式。[……]<sup>24</sup>

這種不帶既定成見、長期居住被研究地區、與當地人交往互動、直接觀察陌生文化的人類學研究方式，至少可以給歷史研究者一個啟示：看待自己的研究對象有如一個陌生的異文化；歷史研究者必須學習從那個時代的價值意義系統出發，以求正確解讀該時代「心態工具」（文學藝術作品）中所呈現的意義，也就是伯克所說的「我們必須學習處身在當時的環境（*en contexte*）中來看」。<sup>25</sup>這種避免年代倒置的謹慎態度，正是一個現代歷史研究者面對陌生的過去時，所必須謹記在心的。我們可以引用費夫賀在《十六世紀的不信問題》〈導論〉中的這一句話作為本文的結束：「我是個歷史學者，就這麼簡單；歷史學者不是一個由既定觀念出發來認知的人。他是個尋找、思索的人」。<sup>26</sup>

---

<sup>24</sup> Peter Burke, *Louis XIV :les Stratégie de la Gloire*, traduit de l'anglais par Paul Chemla,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95, p.46. 此書英文版(*The Fabrication of Louis XIV*)出版於 1992 年。

<sup>25</sup> Peter Burke, *Louis XIV :les Stratégie de la Gloire*, p.23.

<sup>26</sup> Lucien Febvre, *Le Problème de l'Incroyance au XVIIe Siècle : La Religion de Rabelais*, p.1. 法文原文為：parce que je suis historien, simplement , et que l'historien n'est pas celui qui sait. Il est celui qui cherche.